

Northwest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西大经济评论

任保平 主编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研究

第五辑

调节学派视角下的比较政治经济学

Robert BOYER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统筹发展思想及对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

宗成峰

从土地依赖到创新驱动

——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经济学思考

姚树荣 杨文琦

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沿线国家经济依赖度分析

孙 慧 向仙虹



西北大学出版社

西大经济评论

第五辑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研究

Northwest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主编 任保平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大经济评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研究 / 任保平主编.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3
ISBN 978 - 7 - 5604 - 4334 - 8

I. ①西… II. ①任…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发展—研究 IV. 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52983 号

西大经济评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研究

作 者：任保平
出版发行：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
邮 编：710069
电 话：029-88303059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西安华新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13
字 数：244 千字
版 次：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604 - 4334 - 8
定 价：52.00 元

编委会

顾问

何炼成 洪银兴 逢锦聚 刘伟 白永秀 郭立宏

主编

任保平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西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执行主编

宋宇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师博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编委（按姓名音序排列）

安同良	南京大学	孟捷	复旦大学
白重恩	清华大学	钱颖一	清华大学
曹廷求	山东大学	沈坤荣	南京大学
范从来	南京大学	盛斌	南开大学
甘犁	西南财经大学	石磊	复旦大学
高培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史晋川	浙江大学
洪永森	厦门大学	宋敏	武汉大学
胡家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	孙祁祥	北京大学
胡健	西安财经学院	孙早	西安交通大学
黄茂兴	福建师范大学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
黄少安	山东大学	王广谦	中央财经大学
黄泰岩	中央民族大学	魏杰	清华大学
黄先海	浙江大学	吴振磊	西北大学
蒋永穆	四川大学	谢地	辽宁大学
雷宏振	陕西师范大学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
李晓	吉林大学	袁志刚	复旦大学
李新春	中山大学	曾国安	武汉大学
林岗	中国人民大学	张鸿	西安邮电大学
林木西	辽宁大学	张军	复旦大学
刘灿	西南财经大学	张军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张曙光	天则经济研究所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	张维迎	北京大学
卢现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张宗益	重庆大学
马莉莉	西北大学	朱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目 录

CONTENTS

法国调节学派译丛

- 1 调节学派视角下的比较政治经济学 Robert BOYER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 44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统筹发展思想及对我国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 宗成峰

- 52 阶级矛盾的本质及当代发展趋势 王乾宇 马梦瑶

- 低收入群体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研究
66 ——基于陕西省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齐晓亮 李茹霞

新发展理念与中国经济发展

- 76 专利密集型产业绿色创新绩效评估及提升路径 朱承亮

- 从土地依赖到创新驱动
101 ——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经济学思考 姚树荣 杨文琦

- 腐败损害了环境效益吗？
114 ——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检验 郭施宏

对外开放与中国经济发展

- | | | |
|-----|--|---------|
| 134 | 技术因素对中国贸易流量的长期影响和短期冲击
——基于跨国面板的实证研究 | 赵先立 赵 静 |
| 154 |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考察
——基于贸易增加值视角 | 李建军 高 强 |
| 177 | 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沿线国家经济依赖度分析 | 孙 慧 向仙虹 |

笔谈文章

- | | | |
|-----|-------------------------|-----|
| 189 |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光芒与新时代的新思想新光芒 | 任保平 |
| 193 | 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 何爱平 |
| 197 | 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 | 高 煜 |
| 201 |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性 | 师 博 |

调节学派视角下的比较政治经济学^{*}

Robert BOYER

一、引言

最初的经济分析都是与政治决策相联系的，因为经济学要致力于解决每个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例如，货币理论最初就是要解决因美国黄金大量涌入西班牙而导致价格持续上涨的问题。而法国的重农主义者希望解决的问题是，在农业和租金主导下的经济中找寻最适合的税收体系。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奠基者创建了最早的国际贸易理论，并倡导了自由贸易制度。后来的德国经济学家提出了保护新兴工业理论来使本国的经济能够后来居上。传统理论无法解释大规模且长期存在的就业问题，所以也就有了宏观经济学的诞生。从那以后，政治经济学不断发展，解释了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金融危机的起源和全球经济的组织形式，并且提出了应对一系列挑战的策略。

因此，每个历史时期，经济学家都在参与制定城市的政治决策。现在社会中的情况更是如此，因为经济逻辑已经蔓延到了其他领域，如：社会保障、劳动法和医疗保健等等。这个过程中，表现出了经济学家研究兴趣的多样性，他们正在创建适应于企业、银行和金融业的分析工具，其细化和深化特征使得这些管理领域的研究已经明显区别于传统的经济学研究，不再只是研究政府策略和政策。那么，当今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又是哪些呢？

金融自由化曾经被认为是可以形成有效且具弹性的金融体系，为什么它却导致了可与1929年相提并论的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呢？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分析指出，抵押贷款的公共再融资会带来道德风险，而干涉主义经济学家则将责任归咎到了对新衍生产品缺乏管制上。从根本上讲，这两方面的学者都将规避全面危机视为单纯的技术问题。而少数经济学家则认为，华尔街从业人员的道德缺失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政治经济学家的分析则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大型上市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与华尔街的

^{*} 罗伯特·博耶（Robert Boyer）所著的《比较政治经济学》（*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原刊于由伊万诺·卡丁内尔（Ivano Cardinale）主编的《帕尔格雷夫政治经济学手册》（*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978-1-137-44253-6），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获得 SNCSC（Springer Nature Customer Service GmbH）授予的中文翻译版权。本书在收录时略有删节。

金融学者之间的暗中联盟（Boyer, 2005）是非常稳固强大的，足以抵抗住任何管制，可以在次贷危机爆发的时候不加任何条件地成为中央银行保护性贷款的最终受益者。这也就解释了美国金融业的再调节一直进度缓慢且仅覆盖局部地区的原因（Krippner, 2011; Boyer, 2011）。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通过揭示经济动态与政治权力结构化之间的关系，更加深入地分析了这次金融动荡的结构性根源。

为什么全球化如今遇到了许多社会运动的挑战？而且即使在一直支持全球化的社会中亦是如此？标准的经济学理论预测，全球化将会是一种双赢的转型，所有的经济体和社会团体都会从中获利。但不幸的是，理论学家的假设并没有得到当代经济的证实：规模收益递增意味着赢者的多极化，贸易自由化则加剧了失业，而一些国家成为价格决策者，同时，另一些国家则成为价格接受者，等等。政治经济学分析指出，高技能专业人士和大型跨国企业能够从跨境商务活动中获得大量利益，但是低技能工人、小型国内企业以及依靠社会福利生活的人们则被困在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当中，他们在普遍性福利扩大的形势下，必须面临自身福利缩减的局面。因此，可以预见，会发生民主原则与大型国际开放之间存在的这种矛盾（Rodrik, 2000）。英国脱欧与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代表了国内社会群体的经济利益与政治选举抗议的明显脱节，其原因是什么呢？事实上，如果在公投或总统选举时，弱势群体的经济状态恶化，那么将会导致意料之外且大规模的政治抗议行动。而且，国内精英分子的政治战略会转化为经济重组，而这又将引发反对当前形势全球化的社会热潮。因此，经济与政治是共同发展的，在任何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中都应该将这两者之间的互动考虑在内。

全球金融是否变成了民主政治的敌人，进而引发了资本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冲突呢？传统经济学理论将经济与政治领域完全分割开来，因此，其结论必定是错误的。从根本上讲，国际金融学者确实谴责了那些不采取可持续性货币与预算政策的政府。而政治经济学家的答案却没有那么乐观：即使是有原则的政府也要遵从金融学家的要求，在回应市民需求时，就会发生损害利益的情况（Streeck, 2014）。很显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很久了，与之相关联的宏观经济失衡已经产生了结构性的公共赤字，它们一直大量堆积，最终形成了公共债务占 GDP 比重快速增长的局面。与此同时，次级公共债务市场组织将国债的持有方转为国际基金（Lemoine, 2016）。这正是普通市民以金融可持续性的名义提出的需求被忽视的障碍。这是金融力量不断增强的第三个例子。相关的经济不平等扩大已经转化为获得国家权利的不平等以及法律和公共政策制定时出现的不平等。

当我们评价关于当代的这三大主要问题与各种观念及战略的相关性时，可以得到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结论：标准经济学的不幸恰恰是因为它采用非历史的方法，而不断

更新演变的政治经济学则是采用将政治与经济结合起来的综合方法。很显然，理解不同社会所发生的转型以及他们所拥有的国际关系，就要求有效的政治经济学。本章概述一些基本概念，对应的框架是标准经济学。之后本章将说明需要从时间和空间角度呈现或识别资本主义统治下的社会经济制度各种切实可行的方案。这就为进一步研究打开了一扇门，让我们了解可以推动开创新历史时代的复杂过程，包括制度改革、国际化和革命性创新。

二、经济学的不幸及政治经济学的展望

对专业人士而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曾被认为已接近完善（Blanchard, 2007），之后次贷危机的崩溃对这种乐观的评估产生了巨大的挑战。十年后，仍然没有结果，经济学家们也没有达成共识，这就是经济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危机存在的证据。

（一）以公理化方法研究经济的局限性和以制度分析研究经济的必要性

一些经济学家将一般微观理论的原则与现代宏观分析相调和并对此感到自豪。这样一来，他们把实现一个一般均衡所需要的所有假设全部纳入他们的分析框架中。不幸的是，这些假设与实际存在的经济体的核心特征相矛盾。事实上，现存经济体是建立在调节理论所指出的那些关键支柱上的（第4页表1），比纯粹的市场经济复杂得多。

根据存在已久的理论，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决定交易量和相对价格；完全外生的货币供给决定名义价格。这种假设常见于瓦尔拉斯和货币学派的理论，但是它与货币经济的基础相矛盾，在货币经济中，货币不仅仅是计价物，还是交换的必要工具和可以在不同时期转移的资产（Orlean, 2013; Théret, 2004; 2008）。因此由信贷产生的货币具有内生性，其产生的过程因时期和经济体的不同而不同。如果不详细描述货币的产生和消亡，任何宏观分析都无法进行（Lavoie, 2015）。制度分析法的策略是研究对宏观动态极为重要的货币和信贷制度的多样化形态（Boyer, 2015）。

完全竞争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确立的基准，然而商学院教授企业管理者的却是如何争夺市场权力从而确定市场价格。当代形态中大多是寡头定价甚至垄断定价，这点已被产业组织经济学这一特殊分支所确认（Tirole, 1988），但却没有在宏观经济理论学家中得到承认。因此在竞争程度变化时宏观经济活动水平和收入分配发生了很明显的改变。这是一种特定失业形式的成因之一，与凯恩斯主义所说的非自愿式失业有相当大的区别（Benassy, 1982）。调节学派理论提出了竞争形式的概念，旨在观察它是如何在宏观层面影响价格形成的。

表1 资本主义经济中潜藏的制度：从一般均衡理论到调节理论

得到假设	假设的连贯性和相关性	制度形态的作用
①货币仅仅是会计上的统一体，由一个拍卖商主导所有的交易	货币是交换手段和价值贮藏手段，不属于市场经济：事实上拍卖商是一个善良的策划者	货币产生和消亡需要规则，货币和信贷制度决定了市场前提并且使交易去中心化
②所有代理人都是价格承受者	大部分代理人行为有战略性，一些还是价格制定者	与完全竞争不同的多种多样的竞争形式
③劳务和其他商品在同一市场上交易	劳动的双重要素：一是商业交易，二是服从关系	内嵌于制度和法律网络的劳务合同规定了雇佣劳动关系
④国家的缺位	需要外部市场权威管理货币，竞争和公共物品	国家/市场间的关系结构很重要
⑤无国际关系	每个国家仅在有限的领土内有最高统治权	融入国际体系的方式

在有关劳动和工作方面，新古典经济学核心假设的偏离性更加显著：雇佣和薪水与任何其他商品和服务市场中的情形一样，是由供求间的互动所决定的。这一认知是对劳动和它所提供的服务，劳动和劳动力极大的混淆。从理论立场上讲，就“根据市场确定的薪资工作”达成一致只是劳动合同的第一步，之后雇佣者还需服从企业管理者下达的指令才算是履行了劳动合同。因此，这种二元性带来的是由资本—劳动关系中的内在矛盾引发的社会冲突。在广大的社会层面出现的制度化妥协正是试图化解这些冲突的试探性的、短暂性的措施（Boyer, 2015）。这也是调节理论的第三个概念，雇佣劳动关系的意义所在。同样，它并无唯一或典型的形态，关系的多样性正是导致调节模式差异化的关键因素。

宏观经济理论的中心问题备受关注：纯粹的市场经济在何种情况下能够良好运作进而发挥现代意义上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顺着这种思路研究，引入国家更像是对市场运行的负面干扰而不是积极贡献，因为政府干预会破坏竞争激烈的市场所能自发调整的帕累托均衡状态，使经济失去保障。这一无稽之谈仍普遍存在于当代关于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的辩论中。该观点完全无视了多样化的公共干预不仅仅是源自意识形态的压力更是由于市场自身的排他性协调机制产生的局限性所导致的结果（Hollingsworth, et al., 1989）：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一再发生的金融危机，不平等的关系难以维系，在公共产品生产领域缺乏合作。国家—市场间关系是调节理论的第四个制度

类型并且它占据了明确的中心位置，因为它在其他制度之间整合和组织起一个层级系统：首先是二战后黄金年代的福特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接着是竞争体制，最终是金融资产积累体制。

开放的性质和程度是调节理论的第五个维度，它绝不仅仅是开放经济体与封闭经济体传统意义上的对立。民族国家有协商并确立以下领域管理规则的特权：在特定的政治领土内强制执行，协商并确立商品交换、金融资产、外商直接投资准入和最后但同样重要的移民数量的管理规则。这些相关联的规则对宏观经济调整有着明确的影响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当代不同国家经济体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在这一方面，调节理论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了交集：国际贸易理论在无法确定国际体制和每个民族国家融入的形式时，把握经济逻辑和政治目标这一复杂结合体。

（二）大部分制度形式的政治基础

由于训练和专业间联系，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经济制度从单纯的经济目标中衍生：克服市场失灵，将外部性内化，支持教育和科研，解决污染和气候变化的问题（Tirole, 2016）。如果不出现高效的市场，而一般的经济体制又引起不合理的行为或是政策制定者缺乏经济素养时，这些经济学家就会宣称：“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这是一个笑话还是说它意味着这些经济学家无法将市场经济中的基本制度理论化？最近一个名为货币的历史和理论的研究项目极有说服力地证明货币一般来说有着宗教的、象征性的以及政治的根基，而无经济的根基（Théret, 2008；Orléan & Aglietta, 1998；Alary & Al., 2016）。货币史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这一分析方法，欧元的发行也再次证明了：在创造一个真正的货币体制时，其政治的、象征性的和地缘政治的根源具有错综复杂性（Boyer, 2012）。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正是权力在经济制度的诞生中所发挥的作用。调节理论也是这项研究议程的一部分，因为不仅仅是货币体制，所有的制度形式都需要政治和法律流程的共同参与。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劳务合同将经济权利的不对等性显露得更加清晰。这也是不断发生冲突的根源：接近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劳动者在要求更高薪资上掌握主动权，在工作组织中也有话语权，但是在大规模失业状态长时间持续的情况下，会导致企业家与劳动者产生完全相反的要求，即企业会减少对劳动者的让步并且提高工作弹性。这些事件要求政府在就业状况良好时实施干预，给予工薪阶层与企业相抗衡的权利，但当失业成为政府的主要威胁时，要放宽劳动法给予企业更大的自由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雇佣劳动关系出现了不同的风格，并与企业组织和国家的专业化经济共同演进。例如，欧洲国家已经发展出了一个将资本—劳动关系纳入特殊分支的法律体系，但在美国，提及商业合同的变种就被默认为指代的是劳动合同。通信和信息技术带来的机

遇模糊了商业合同和劳动合同的边界，这一认知因而被强化了。这些特点是宏观经济调整，即调节模式存在鲜明对比的根源。

表2 任一制度形式中的政治组成为比较政治经济学开启的研究议题

制度形式	政体的作用	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成果
①货币体制	货币单位，法律规定，信用管制的制度化	货币非中性，因此体制多元化
②雇佣劳动关系	监控资本和劳动间的社会矛盾	管理劳动的多样化方式
③竞争	定义并强制执行“公平”竞争的构想	跨历史时期和跨领土的变化性
④国家—市场关系	政治构想和计划的核心点	从社会冲突和经济危机中寻求创新
⑤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	捍卫国家主权观念	远离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之间的二元论，多种制度并存

完全自由竞争远没有到吸引所有经济体向之靠拢的地步。相反，人们观察到从朝阳行业中寡头垄断的建立，到之后寡头垄断的地位因货物和技术的扩散受到侵蚀，创新租赁因追随者进入市场而遭受侵蚀的这一长期过程是周期性波动的。尽管如此，一些竞争体制倾向于偏爱那些投入资源去影响规制者的决策从而获得政策优势的生产者，而其他生产者需应对消费者施加的压力，消费者想要更激烈的竞争，以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更低的价格。竞争的准确形态因时期和国家经济体的不同而不同。竞争形态的出现和演变离不开政策制定者的参与，因为历史表明，不加约束的竞争会导致寡头垄断或垄断占据统治地位。因此，只有一个不直接参与经济的有权威的行为者，可以设法抑制这些趋势。这个行为者即是国家，政治过程的复杂性再一次阐明了第三种制度形式，即竞争制度的性质。

国家不能沦为一个只是稳定经济和提供“自然”公共物品的纯专业角色。一方面，公共物品实现高效供给与经济学家们提出的需要将教育与、健康、科研相关的外部性内化的学说无多大关联：公共物品的供给是对公民和社会团体不断产生的社会和政治需求反应滞后的结果。经济效率的提高是应对这些压力导致的结果。同样地，税收制度也谈不上是在应对经济上的挑战做出的回应，因为它是主要利益集团相对权力下沉的体现。对于观点正统的经济学家来说，“经济政策”一词，如果不是“法律”的话，指的是系统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在政治问题上的应用。对于政治经济学家来说，国家在

干预前需要分析经政治联盟同意的政策的经济后果和可行性 (Palombarini, 1999)。另一方面, 调节理论增添了一个更全面的假设: 应特定的政治联盟要求, 国家—市场关系必须与制度形态的体系结构相一致, 当社会团体间权力的分配严重不对等时, 调整不同制度形态间的互补性或它们的层级结构。例如, 黄金年代欧洲大陆的商业法会承认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工薪阶层同等重要, 但当代的美国与之相反, 股东独占大权。这种制度的长期合法性存疑, 特别是当公民最终可能投票反对政府的时候。(捆绑问题: 视觉信息在意识中是怎么重新组装的?)

所有的制度形式, 不论是权力中央化的民族国家或是两种行政体系并存的联邦制, 都在一个政治空间内运行。融入国际关系的形式和程度事关政治决策: 它是维护了政治联盟以及与国家主权关联的自治权, 还是威胁到了社会治理能力? 在这两种极端之间, 每个政府都有能力把关税、外部贸易规则、鼓励或限制外资进入、汇率制度和当前热门的移民问题整合到一起解决。然而这一复杂的混合体也需要不断调整, 以应对世界经济的起起落落和过去制定的政策中受益者和受害者身份的转变。政治经济学因而拒绝了国际理论的和平主义观点, 扬言所谓的“全球化”对所有国家经济体和它们所有的公民来说意味着共赢是不正确的。一些国家完全且迅速地向外国开放商品、服务、生产性和金融性资本流动可能会导致结构性危机, 与此同时, 经济生存能力、金融稳定性、社会凝聚力和政治合法性都会面临风险并最终崩溃。2000 年阿根廷危机就是这一过程的标志性展现。(Boyer et al., 2004; 2007)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至少有三个优点: 第一, 它使经济学重新融入其他社会科学中; 第二, 它从通过社会运动和政治进程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制度的产生, 第三, 但同样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学采用了比较的方法论, 这有助于理解社会经济制度的多样性 (Théret, 1997)。

(三) 经济制度塑造个人理性行动和企业目标

传统的经济理论是建立在绝对理性的基础上的: 孤立的个体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将效用最大化, 然后在一系列的市场上直面他们得到的供给和需求, 这是唯一明确可利用的协调机制。无数的微观决策直接决定宏观经济的产出结果。在目前的框架内, 制度形式决定了处于个人和企业战略之间的中间层面, 它们给广大社会层面带来的附带影响。考虑到制度内在的惰性, 做出的日常决定都要与制度所表明的激励和约束的内容保持一致。因此, 现在代理人制定的最符合他们利益的总体原则决定了一种依赖情境或者制度的理性行为。(Boyer, 2015)

这一设想的应用为消费者理论的两大支柱提供了另一种方案: 存在的偏好无关社会情境, 效用最大化只取决于所消费物品和付出的努力。许多证据表明, 这两个假设

是无效的。显然，在当代社会，消费规范是竞争激烈的模仿过程的主要关注点，企业出于扩大市场力量和提高利润率的目的创造的新发明进一步刺激了该过程（Frank，2010）：微观经济学理论很少考虑这种相互依存的形式。同样地，个人追求的目标取决于生产、社会和政治情境，制度主义理论的一个分支甚至假定个体所设定的目标几乎完全由情境决定（Douglas，1986）。

在这个阶段，政治经济学必须与年鉴学派阐述的经济史相结合，那其中提供了多个典型制度结构的详细描述。例如，为什么中世纪的农民将他那些小块土地的位置分散化？对于研究当代农业的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一种纯粹的非理性行为：这个农民应该重新规整他的土地，以从规模报酬递增中获益。但这只是一种时代错误，因为我们是从当代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角度来分析中世纪的农业经济的。事实上，贫农因为要面对接连不断的气候灾害，所以要通过最大程度的分散化耕种确保他的所有耕地收成风险最小化：河边耕地被淹，但山上耕地结白霜。这一行为并非不理性，相反，它是在试图去适应一种以周期性的饥荒为标志的古代调节规则，这符合马尔萨斯的理念（Boyer，1991）。同样，富有的18世纪法国地主急于宣扬重农主义理论，设法影响税收或关税水平，以保护自己的利益。第三种形态以美国或阿根廷农业为例，两国文化中创新的涌动扩大了规模报酬。

当一个人比较19世纪工匠、亨利·福特的员工、硅谷的风险投资家和丰田的工人所拥有的目标和资源时，主要的发现是个人理性行为因高度依赖情境而具有极端多样性（第9页表3）。这一点甚至不需要用“交易员”或“金融工程师”的例子来说明，社会认为他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实际上他们的行为是建立在利润共享和风险承担之上的薪酬体系导致的：它主要出现在金融主导的资本主义中（Godechot，2001）。

与此矛盾的是，理性行为原则正是在现代公共管理的框架内表露得最为清晰，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不是使其融入资本主义经济中，而是制定并协调能使它茁壮成长的规则和惯例（Weber，1921）。如果我们把这一分析扩展到现阶段，在全球化浪潮中，金融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推动公共行政部门改革的恰恰是私营部门的方法，这难道不是一件很不同寻常的事情吗？私营部门使用的方法传承自历史，他们起作用的方式与另一种体制有关联，在该体制中国家政策有设计关键制度形态、间接地设计私营经济组织的能力和主动权。这是当代自由主义策略的核心，其中一个标志性的例子是大不列颠（Faucher-King et al.，2010）。下述言论为现实主义社会微观经济的宏观制度基础确定基石。

表 3 有多少种情境个体就有多少种理性行为

	贫农	富有的地主	商人	韦伯式理性官僚	福特主义蓝/白领	投机资本家	交易员
目标	生存面临不确定性	绝对和级差地租	职业独立性	管理的有效性	职业收入	探寻划时代的创新	奖金及分红
推理/辩解类型	维持家庭收入	重农主义	保持生活方式所需的工作	实质理性	提高竞争力的利益相关者	对技术进步的贡献	市场流动性
行动类型	耕地分散化	维护土地所有权，政治权力的控制	团队协作，薪酬与产出挂钩	正式程序的制定和协调	对企业忠诚	投资组合多元化	应对激励，承担风险

（四）告别虚幻平衡和稳态增长

处于制度形式核心位置的是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现在让我们更直接地讨论它们的理论关系，并从中导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动态模式。

第一步从概念的角度认识这两个领域的独立自主性。经济领域中财富积累是在市场交易支配的空间中完成的。政治领域侧重于权力的积累，并且在原则上要求合法强制权。在最抽象的层面上，因要竭力抵抗住向另一方施加影响的诱惑，这两个领域是异面垂直的：一方面，经济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之一，现今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思想，而另一方面，已被遗忘的政治主义会使经济体中的一切都关乎政治。

在第二层次的分析中，如要良好运作每一个领域需利用来自另一领域的资源，这并非偶然。一方面，经济逻辑的运作离不开政治提供的条件：稳定的货币和信贷制度，商业和劳动法，维护国家主权的合法公共权力机构和必要的集体基础设施，经济逻辑放任不管的情况下，许多机构在长期无法发展甚至无力维持。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财政资源，也不融入经济中，政体将无法满足权力的积累这一首要目标。这一目标与经济虽无直接关联，但需要通过税收制度和公共支出来实现。

因此，这两个领域倾向于协调发展，总会有一种相容方式胜出，因为在事后，必须以某种方式相容。历史经验表明一个重要的结果：这两个逻辑，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没有成功地将自己强加给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当市场无处不在并变得无所不能时，它就不可能以它自己的逻辑来生产和复制它的三个支柱和先决条件：货币、劳动、自然。就此而言，苏联政权的失败说明了政体无力操控社会的物质再生产，简言之，即无力同时管理商品和人民，并将它们合并成一元化的整体。因此，政治体制和经济

体制注定要共同发展，因为这两种极端结构中的任何一种（即“一切皆政治”或“一切皆经济”）从长远来看都无法被接受（Théret, 1992）。

因此，研究者必须放弃建立在静态平衡概念上的新古典理论的完美设想，而静态平衡也属于帕累托最优。不能认为经济政策的作用就是寻求这种平衡。与此相反，调节理论认为政治联盟正在发起一个动态的进程，最终会脱离哪怕是最强大的、掌握最多信息的行动者的控制（图1）。政府的统治要经历周期性的复杂的演变，时而出现结构性危机，同时伴随着政治和经济危机，稳定的状态并不多见（Palombarini, 2001）。宏观经济的现象是某一特定政治联盟的意外后果。例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可通过运用有效需求理论实现充分就业，然而如果雇员不是统治联盟的成员，这一点就不可能实现。人们需衡量规范理论（根据X理论，这是最好的或至少是不错的政策）和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有什么因素能解释Y政策被有效采纳）之间的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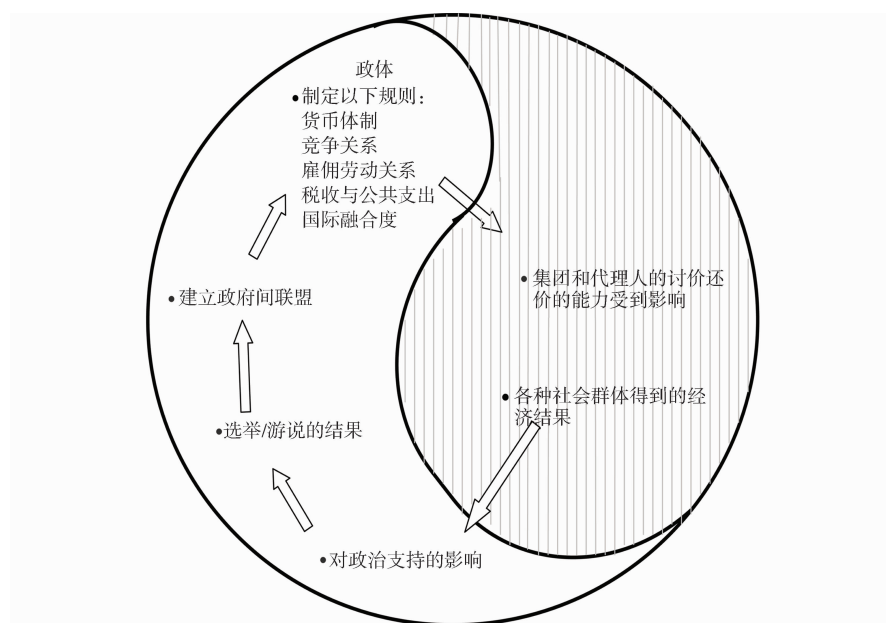


图1 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相互交织引发了一个永无止境的动态过程

最后的结果是，不可能提出一个精确适用于所有社会的“一般理论”，因为必须先给社会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开始分析。它必须阐明政治制度的性质，解释与政府联盟的形成有关的社会群体的建构，引导不同社会经济群体间产生合作或排斥的行为的有关变量在很大程度上由现有的调节模式决定。这与“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程形成鲜明对比：将新古典主义工具应用于政治决策，使最优政策具有普适性（Drazen，

2002)。它常常不加提防地推断出一个国家（通常是美国）具有代表性的准确结构，但在其他大多数情况下是有问题的。事实上，民主的形式至少与资本主义的品牌一样多，因此可以观察到很多具有鲜明特征的政治经济结构。

（五）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区别及其原因

市场经济的概念是传统经济学的核心，它暗示市场是协调经济活动的主导机制（如果不是唯一的话）。国家、团体、民间社会、组织网络和公司被事先排除在外（Hollingsworth, et al., 1999）。人们因此为经济人士辩护，认为这证明他们谦逊且野心有限，而这种野心和谦逊仅存在于经济领域。但是，一旦实际观察结果与市场自我平衡假设相矛盾，新古典经济学家就倾向于把相关的失灵归因于“纯粹”自由市场理想的不完美。为什么这种不完美如此广泛地存在，例如，在劳动和信贷方面，原因很简单：这些市场扎根于社会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之中，对自身（经济）利益的单纯追求和向最佳平衡的靠拢被扭曲。这正是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

与经济学不同的是，一般均衡理论（GET）是传统宏观经济学家进行实证分析时的隐含，并且常常是显性的基准（Lucas, 1981）。与他们一再的声明相反，市场经济研究方法并不一定缺少价值判断，因为它认定效率是评价绩效的关键标准，市场是追求自身利益的独立自主的个体之间较为完善的协调机制。的确，对于一些激进主义者来说，市场是唯一完美的机制。

我们永远不应低估市场经济概念里规范性的内容。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自亚当·斯密（1776）以来，经济学家就把市场抽象地看作是价格机制本身。“市场”这一说法的力量相当强大，因为它的使用已经扩展到社会学（婚姻市场）或政治学（思想和政治纲领市场、中位选民投票市场等）的某些领域。

政治经济学家所持的资本主义理念，为大多数传统经济学家开启了意识形态建设，这种建设本应由自由主义的学说支撑，即支持封建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际上，它也可以是分析工具。资本主义的综合定义是：在历史上展开的一种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和一种社会形态，它建立在两种基本社会关系之上：市场竞争和资本/劳动关系。关于市场经济的区别并不纯粹是语义上的（第12页表4）。

第一，市场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无法将其他协调机制或包括企业在内的行为者排除在外。

第二，资本主义本质上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体系，因为它需要法律规则和一种精确的政治权力分配。经验观察表明，与单一经济体系相比，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态更加多样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学说如此强调资本主义各个阶段（商业、工业、金融、认知）的存在和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品牌多样性。